《学术界》(月刊)
总第 266 期,2020.7
ACADEMICS
No.7 Jul. 2020

以共生共在的国际伦理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以新冠疫情为分析背景

谢新水

(首都师范大学　管理学院, 北京　100089)

〔**摘　要**〕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包含了对人类命运普遍、平等、公正而深入的关切,这种伦理指向的包容性关切来源于对生命平等的肯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需要通过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路径,还需要通过伦理路径,只有这样才能整体而有效地推进。在新冠疫情背景下,世界各国的利益距离、政治距离和价值距离都面临扩大的趋势,而家庭和社区作用的重启则意味着伦理距离在逐渐缩小,因此关注伦理精神的复苏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的突破口。在宣传、沟通、对话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作行动中,需要进一步凸显共生共在的国际伦理精神。将共生共在提升为国际伦理准则并使之融合在现有的经济路径、政治路径和文化路径之中,更有利于促进世界各国团结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共同应对全球公共安全危机,更有利于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如果忽视共生共在的国际伦理精神,就忽视了引导全球合作的新力量。

〔**关键词**〕共生共在;国际伦理准则;人类命运共同体;伦理距离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0.07.002

一、引　言

目前,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主要有经济、政治和文化三条可见且有效的实践路径。在经济领域,通过区域经济合作、共建共享、合作共赢、共同发展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是一条有吸引力、凝聚力、高效快速的路径。在政治领域,不同国家间的政治合作是有效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前提,选择政治路径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然要依靠国家层面的政治权力来推进和重塑国际关系。在文化领域,通过文明对话、文明互鉴来阐释、理解、消除文化差异,以此促进世界各国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同样是基础性的构建路径。尽管这一路径看起来见效缓慢,但成果会更牢固、发展更长远。如果从学术层面来整体审视,可以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不仅影响,甚至可能限制了理论研究者的视野,因为目前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研究大都在这三个层面推进,也可以说拘束在这些路径之中。理论研究者需要注意的是,具有

作者简介:谢新水,博士,首都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研究方向:政治哲学、合作治理理论。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共享经济合作规制治理研究"(19FZZ009)的成果。

深刻包容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包含着对人类命运的整体、普遍、全面的关切,这种伦理关切是基于生命平等来判断的。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性合作行动是具有伦理指向性的。忽视或者放弃从伦理层面来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可避免地要带来理论局限。

目前,一些文献从伦理层面研究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问题。有学者指出,作为一种伦理实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应对人类与自然、人类与社会、人类自身三个层面的问题,相应地就形成了生态伦理、商谈伦理和实体伦理。[1] 从国际伦理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全人类的合作行为,涉及了全球伦理的整体架构、当代国际关系伦理的内在要义和人类伦理文明的发展趋势。[2] 为了取得伦理行动能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解决五大国际伦理问题,以此去抵制国际无伦理的思想。[3] 概而言之,通过伦理路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重要的行动方向,但目前的文献还没有指出坚持伦理路径、开展伦理行动和发展伦理文明的具体进路。以此为基础,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通过伦理路径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各国要培养什么样的国际伦理精神,要遵守并践行什么样的国际伦理准则,要发展什么样的新伦理文明呢?

根据今年全球疫情所形成的人类命运的境况,我们认为,在应对全球重大公共安全危机中,共生共在的伦理精神是国际关系构建过程中需要遵循、践行的伦理精神,共生共在的伦理准则是促进全球治理的基本伦理准则,共生共在将成为全球新的伦理文明。因此,本文主要分析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探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合作行动中的四重距离;二是透过新冠疫情分析共生共在伦理精神的复苏及其现实需求;三是提出了以践行共生共在的国际伦理准则来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主张。

二、全球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四重距离

任何合作行动的开启、顺利运行以及取得成效都会面临利益距离、政治距离、价值距离和伦理距离的考验。作为一种全球性的合作行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样会面临这四重距离的考验。

(一)合作行动中的四重距离

第一,利益距离。利益距离是自我利益和他者利益间的距离。社会历史发展表明,利益是思考国家、民族和个人行动最基础、最重要的要素。在国际关系中,通过意识形态、法律制度、政治诉求等方式来积极保护本国利益是国际社会的基本事实。当合作行动启动时,不管是个人、组织还是国家都会优先维护、保障甚至扩大自身利益,也只有在自身利益得到有效维护的前提下,才能考虑他者的利益,考虑和他者合作。因此,在思考和解决国际问题的过程中,任何忘却利益距离的理想主义行为都难以推进新合作行动。如果忘却利益要素、忽视利益距离,那么,在实际行动中必然会碰到巨大障碍。

由于利益距离的存在,当新的合作行动启动时,合作各方需要通过协商、谈判或边谈边做等方式来协调并形成双方或多方能够接受的利益距离。可以说,合作行动从启动、运行至圆满结束就是一个持续缩短利益距离的过程。一旦新的合作过程中利益距离失衡,合作行动就会遇到新的障碍,合作各方就要重新启动利益协调,以此来缩短利益距离。由于全球治理的复杂性,在推进全球合作的过程中,利益要素不可避免地成为重要变量,而且全球合作行动的道路很难平坦,会随着利益距离的增大而导致合作行动搁浅、停滞,甚至重新转化为竞争与冲突。需要提醒的是,由于人类未来的重要性,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的全球合作行动中,世界各国不能仅仅将利益作为考虑要素。在利益方面,最重要、最关键、最有效的方式是通过共商、共建、共享的方式来扩大合作利益,进而分享合作过程中获得的新利益。

但是,在既有的竞争性国际关系框架和政治竞争思维中,过度注重利益的思维难以一下子改

变,利益问题依然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问题。有国外学者指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中国利益”问题:“在旧有的国际秩序的不利情形下,中国利用日益崛起的力量,必然要在全球治理过程中追求国家利益,因此,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上是中国崛起后的利益要求”。[4]对于“亚投行”的建设,有国外研究者也针对利益问题提出了看法:中国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部分原因也是为了维护新秩序中的利益。由于经济利益可以用货币来衡量,这类利益是显性的,即使文化背景不同的国家,对经济利益的理解也基本相同,正是因为利益的可见性,在新合作行动中消除利益距离就相对容易。

第二,政治距离。政治距离是因政治体制、政治隔离、冲突和斗争等政治因素而形成的距离。由于政治主张的差异性、政治权力的竞争性,国际国内政治派别、政治团体间总存在政治距离。就国内而言,由于政治纲领、政治主张不同,国内政治派别和政治团体之间要通过竞争行动去获得政治权力,因此它们之间必然存在政治距离;但只要不是彻底对立的政治团体,缩小或者消除这类政治距离的机会总是存在的。就国际而言,不同国家间的政治距离是由政治体制、政治文化和各种利益冲突等因素综合形成的,因此,在全球范围内消除政治距离的难度就很大。例如,虽然世界各国都非常清楚意识形态对抗是价值耗损非常大的对抗,但一旦形成了全球性的意识形态对抗,对抗国家间的政治距离就很难缩小,更难以消除。

需要注意的是,政治体制不是决定国家治理能力的唯一要素,也不是决定国家间政治距离的唯一要素,政治距离不是一个常量,而是由众多因素引发的变量。因政治体制、政治文化等因素所形成的政治距离是影响全球合作的关键要素。保罗指出:“合理行动是一种就其初始状况来说其重要性超越恰当性的行动。”[5]就合理性来分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与人类未来发展、人类的未来命运密切相关的全球性行动,因而对所有国家来说是重要且必要的行动。然而,由于全球竞争格局和旧国际秩序的存在,世界各国的发展程度和发展需求不一样,这一行动也就成为了全球最有难度的合作行动。当然,只有在重要性和恰当性同时具备时,构建全球意义或者区域意义的命运共同体才能达到预期效果。

第三,价值距离。价值距离是因自我价值和他者价值差异而形成的距离。价值距离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价值距离是隐性的。与利益距离、政治距离相比,价值距离是程度更高的隐性距离。二是价值距离有代际性。不同时代的人有代际距离,以此形成的代沟会影响价值距离。三是价值距离有文化性。因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化、文明有自身特色,对相同的价值概念如民主、平等、公平、公正等就有着不同的理解,相应地就会产生价值距离。由于文化、文明等因素总是深层次作用于人的思维之中,因此价值距离是最牢固、最难以撼动的。

价值是引导、指导和推动合作行动的重要因素,也可能是屏蔽、拒绝、否认合作行动的关键要素,启动合作行动需要价值认同的支持,然而人们对新合作行动的价值审视可能形成反对、漠视与认同三类结果。因此,一旦价值距离变大,协调合作行动的难度就随之加大,而且价值距离很难在短时间内弥合。就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而言,在理解了利益距离和政治距离对合作行动的影响后,还需要密切关注价值距离。例如,就“一带一路”倡议而言,中西方学者就有不同的看法。中方学者认为,由中国政府提出的、带有世界性关怀的“一带一路”倡议,激发出人类学既有传统中的对于互惠观念的再发现,互惠原则将成为“一带一路”倡议中可持续性发展价值观念的基础。[6]西方有学者却认为,通过对“一带一路”的历史叙事和实践举措,中国将自身置于“促进不同文明相互理解和交流的乌托邦理想”的中心。[7]由于价值距离的存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美欧日的一些学者普遍将人类命运共同体视为中国崛起后的战略表达,认为其挑战了西方

主导的全球治理体制,并试图将国际秩序中国化,将对现行的国际秩序造成冲击。[8]即使共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等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行动价值理念在概念上有共同性,但一旦进入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传统、文化、制度、政治意识形态和所面临的具体问题语境中,在认识上的差异便出现了。[9]在现实的合作行动中,由价值差异形成的距离会阻碍合作行动的发生。

第四,伦理距离。伦理距离是因伦理观念、伦理精神、伦理思想、伦理文化、伦理准则等方面的差异而形成的差距。本文的伦理距离仅指不同国家、民族和个人在认同他者生命、生存、生活价值的过程中形成的距离。人和人之间伦理距离的存在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不安全感。人是缺乏安全感的动物。由于一些种族、民族间世世代代存在地域隔离,人的流动性差、交往缺乏,对陌生的他者总是缺乏安全感,因此陌生人之间形成的是“人对人是狼”的困境,自我很难感觉到和异地异国的他者命运相关,更不要说“共命运”了。二是理性和情感的冲突。随着科学的发展、全球流动性和信息传播的加速,人类认识到了他者的重要价值,但这只是自我对他者理性上的认同。然而,人是情感动物,要从情感上建立对他者的认同,不但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需要通过友好的合作交往才能促成。三是社会的竞争和冲突。人类社会大都处于竞争和冲突的社会发展状态,黑格尔、马克思和萨特等哲学家看到了人和人的普遍矛盾、内在的否定性以及由此引起的不可避免的冲突。[10]在这样的状态下,民族国家间的利益距离、政治距离和价值距离总是很大,在竞争和冲突过程中,伦理距离也会随之越来越大,甚至会漠视伦理价值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意义。

尽管人有怜悯之情、恻隐之心,但个人对自我的关注远远胜过对他者的关注,个人对自我利益的关注也远远超过对他者利益的关注,这是人性的一部分。随着占有社会、市场主义、个人主义的兴起,人的“自我”越来越凸显,对他者进行伦理认同的难度也因此越来越大。在隔离、竞争、冲突或者漠视的文化中,只在血缘或拟血缘共同体中,伦理认同才得以实现,而在国家、民族和组织之间要形成伦理认同还是非常困难。然而,在后工业社会,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人类步入了合作的社会,特别是在面对全球重大公共安全危机时,人类对伦理精神的需求会越来越强烈。这就要求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要进一步挖掘、培育并形成新的伦理理念、伦理精神、伦理文化,并践行新的伦理准则。

(二)四重距离互动的特点

其一,合作行动过程中四种距离的互动性。对每个国家、民族乃至个体而言,坚持自我价值,争取自我利益是正常的思维。理性的主体不能对别人求全责备,不能单方面要求他者缩小利益距离、价值距离、政治距离和伦理距离。然而,只是有限理性却自以为具有完全理性的人,一旦认为他者与自我利益相左,就会认定他者理性不足抑或是非理性的。由于有限理性的存在,特别是情感等非理性因素的影响,在合作过程中,无论是利益距离、价值距离、政治距离还是伦理距离都是变化的。这些变化是合作主体互动的结果。在合作过程中,不能忽略四种距离的互动性,因为成功的合作会逐渐缩减四种距离,而不成功的合作必然会增大四种距离。

其二,合作行动过程中四种距离的动态平衡性。从现实生活中可以了解到,只有你情我愿交往才能顺利进行,其实,你情我愿的过程就是四种距离变动、缩减,最终让合作主体持续合作的进程。理论上而言,只有缩减或者消除四种距离并达到合作者可接受的程度,合作才能顺利进行。在合作过程中,即使合作主体之间偶有矛盾,只要合作距离没有影响合作结果,合作就会顺利。进一步而言,成功的合作过程就是四种距离动态平衡的过程,一旦这种动态平衡被破坏,合作就会停滞甚至转化为冲突。

其三,合作行动过程中四种距离消除难度的差异性。合作过程中的利益距离可以通过经济

合作来缩短与弥合,政治距离可以通过政治合作行动来缩短,价值距离可以通过文化交流、文化包容来跨越,但伦理距离却很难找到缩减的路径。霍夫斯坦德发现,20 世纪中期以来,民族国家的出现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现象。“国家”是由整个世界划分而成的政治单位,每个人都应属于其中的一个,正像他/她的护照所表明的那样。[11]一旦国家、民族、种族这些想象的共同体得以构建,国界、组织和社区边界得以形成,四种距离就隐藏于其中,而在现有国际伦理文化背景下,消解伦理距离最为艰难。

(三)消解伦理距离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价值

后工业社会形成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境况,人类将越来越感觉到,人类社会是一个“地球村”。虽然,这个“地球村”中的人属于不同的国家、民族、组织和家庭,但在共生共在的问题上,整个社会则是具有总体性的。[12]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新冠疫情,对世界各国的影响是巨大的。由于目前的科学研究还不能完全把握、彻底控制疫情的发展状态,因此,在应对新冠疫情方面,世界各国很可能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当世界各国面对重大疫情等公共安全危机时,就形成了共生共在的生存境况。这一生存境况将冲击、更新人类现有的伦理思维,进而重塑全球伦理观念、伦理文化和伦理文明,为消除全球治理中的伦理距离带来了新的希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带来了新的思路。这就要求我们,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既需要坚持经济路径、政治路径和文化路径,又需要通过伦理路径来寻找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新的突破口。

三、共生共在伦理精神的觉醒及其现实需求

理论界对新冠疫情的发生和蔓延忧心忡忡,实践界同样担忧不已,因为它对社会生产、生活秩序的影响非常巨大而深远。尤瓦尔·赫拉利指出:“人类现在正面临全球危机,也许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危机。”[13]他指出:“在危机时刻,我们面临两个特别重要的选择。第一个是被监视与保护个人隐私之间的选择。第二个是在民族主义孤立与全球团结之间的选择。”[14]在信息化时代,隐私风险是普遍性问题,也是普遍性风险,因为“人的信息化”不可避免地要扩大,人们不得不面对隐私风险。新冠疫情来临后,世界各国加大了对行动自由的管控力度,通过各种技术来收集、监控人的行动轨迹,必然会累积隐私风险,隐私问题也成为了这一特殊阶段的重要问题,也是全球化、信息化时代需要全球面对的普遍性问题。如果真如同赫拉利所提出的,新冠疫情将导致世界各国在民族主义孤立与全球团结之间作出选择,那么,这个问题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就密切相关了。为了更清楚地探析这一问题,就需要深入探究新冠疫情对全球合作行动中四种距离的影响。

(一)新冠疫情发展对四种距离的影响

本质上,有效应对疫情需要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需要缩小合作距离,加大全球合作。然而,在一定时段内,新冠疫情可能带来全球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合作萎缩,尽管这种影响不会持续长远,但短时间内国家间的利益距离、政治距离和价值距离有扩大的趋势。与此同时,另一个全新的现象随之出现,那就是,重大公共安全危机带来的新压力将影响人类对伦理距离的感知。这一新的压力会促进世界各国的伦理觉醒,缩短全球合作过程中的伦理距离。

其一,全球经济合作趋向萎缩,利益距离扩大。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年度贸易统计和展望报告称,新冠肺炎疫情破坏了全球正常经济活动,2020 年全球商品贸易预计将下降 13% 至 32%。[15]这是因为,有效疫苗还没有生产,严重的疫情迫使世界各国处于一种封闭或者半封闭的状态,而且疫情过后全球贸易很难马上恢复常态。面对新冠疫情对全球供应链冲击造成的巨大影响,世界各国要防止合作距离扩大所形成的“逆全球化”问题。从现实情况来看,当前全球

经济合作确实面临萎缩的威胁,因疫情的影响,国际组织的协调力量也变得微弱,未来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新动力来推动。

在全球化过程中,经济驱动是最坚硬、最强大的支持力量,一旦全球经济因疫情对流动性的冲击而放缓或萎缩,恢复既有的全球化状态,进一步提高全球化水平,就需要世界各国更主动、更积极的参与,更需要世界各国通过各种激励制度来激发经济信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指出,随着疫情扩散,加强全球协调行动是提振信心和稳定全球经济的关键。各国应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及金融监管协调,共同应对疫情。[16]为了控制全球利益距离的扩大,二十国集团提出了维护世界经济发展的申明:“我们承诺竭尽所能,使用现有一切政策工具,降低此次大流行病对经济和社会造成的损害,恢复全球增长,维持市场稳定并增强经济韧性。”[17]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政府为提升全球经济信心作出了巨大努力。随着新冠疫情的发展,维护全球化、进一步缩小世界各国的利益距离,考验着世界各国的合作能力,本质上,就是考验世界各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解,考验着世界各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能力。

其二,全球政治合作动力弱化,政治距离存在扩大风险。疫情的破坏力干扰了全球政治合作的结构,或者说给一些不合作国家找到了“理由”。在全球疫情发展过程中,尽管中国和其他国家在促进全球合作方面作出了重大努力,但全球政治不信任的状况正在加剧,且有因疫情恶化而进一步加剧的可能。从国际关系的发展来看,美国政府由于过度强调“美国优先”策略、过度算计自我利益,加上其世界大国的地位和影响力,致使“逆全球化”有所抬头。虽然美国的“逆全球化”行为遭到了诸多国家的批评,但在目前的世界格局中,它依然是一个巨大的,难以对抗、阻挡和消除的力量。当然,作为时代潮流的“全球化”不会因此停止,只是在全球“中心—边缘”结构的作用下,处于世界秩序中心的美国的“逆全球化”举动,不可避免地要对全球化进程带来冲击,也不可避免地要引发一些新的矛盾。

控制新冠疫情带来的危机及其破坏力需要世界各国的治理向内发展,或者说,世界各国不得不暂时有选择性地缩小国际政治活动,降低参与全球治理的行动幅度,减少国际义务的承担,这样一来,全球合作不可避免地就遇到了阻力,链接全球的合作动力会暂时减弱。从理论上而言,疫情带来的重大公共危机让世界各国更容易理解人类共命运共同体思想,更容易理解合作共赢的道理,更容易理解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合作行动,推进全球治理的合理性和重要性。但从理论到实践很难跨越,因为“行动的话语本身是从一个施动者流向另一个施动者的互动处境的一部分”[18]。当国内遇到重大政治冲突或者问题时,转移民众的视线是一些政治家输出、化解国内矛盾的惯用手段。在疫情发展过程中,为了缓解国内政治压力,一些国家及其政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必然有加大力度攻击其他国家的可能。

全球化是与后工业化联系在一起的,全球化进程中的对立和冲突在根本上属于新与旧的对立和冲突。[19]由于旧有国际矛盾的影响,外加疫情的冲击,世界各国会有意无意地形成新的排斥性力量,这些排斥性力量可能导致国际合作的进一步弱化。然而,后工业社会是一个加速变迁的社会,“空间、物、行动、时间、自我这五个新的异化的形成,让现代人对于不断加速的生活节奏感到困扰不堪。”[20]在这一大背景下,如果世界各国之间相互指责,矛盾越积越厚,各国之间的政治距离就会越来越远。如果国际组织不能及时推动国际问题的解决,随着一些国家快速“退群”产生的负面影响,一些国际组织存续和行动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考验,甚至其合法性地位也受到质疑。当然,乐观地看来,尽管在疫情发展过程中,在沉重的地球上,世界各国都是受害者,相应地,全球化的发展就变得缓慢且艰难,但全球政治文明和政治秩序不会因此彻底改变。

其三,全球价值凝聚难度加大,价值距离接

受考验。保罗指出:“我们并不是在同一个语言游戏里谈论在自然界发生的事件和人类进行的行动。因为,为了谈论事件我们会进入包含着诸如原因、法则、事实、说明等概念的语言游戏里。”[21]虽然,世界各国已经走进了全球化、信息化时代,通过网络媒体立体化、渗透式的传播,各种不同价值的话语大多能够被广泛传播,甚至成为全球皆知的话语,但是开展有效的对话形成共识却更加艰难,在“意见世界”之中,按照共识话语统一行动依然十分困难。

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到,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造成沟通技术发展但沟通困境加大的原因主要有四个:一是基于话语的事实只是部分人的遭遇和经历,但所有人都希望表达、评论和判断未经历的事实;二是全球已经进入了智慧、话语权和话语影响力分裂的时代,即使重要人物的话语也很难得到整体性认同,恰恰相反,权威的、重要的话语会受到更严格的审视和批评;三是全球话语要接受以不同文化为基础的、差异性的价值审视,难以形成统一的行动共识;四是一些国家千方百计利用于已有利的话语及其在国际话语权中的优势地位去寻求、维护自我利益。

图海纳看到,“社会媒介的破坏使文化领域的全球化与无数的社会行动者对立起来。这种多元文化主义的阴暗面有把每一种文化都封闭在无法沟通的个别经验之中的危险。”[22]通过新冠疫情可以看到,世界各国的价值凝聚能力正在接受考验。在应对疫情过程中,一些国家出于民族主义的目的或自我利益的谋求,试图以凸显竞争理念的方式开展价值博弈,并寻求零和博弈的结果;另一方面,由于疫情的影响,一些民众更愿意支持国内政治家向内控制的意愿和趋势,民粹主义可能抬头,凝集全球价值的国家意志及其民众基础随之削弱。在这个过程中,世界各国合作行动的价值距离会相应增大。

其四,全球家庭与社区作用重启,伦理距离正在缩小。在全球抗疫过程中,“封国”“封城”、社区封闭管理、居家隔离等成为切断传播途径、控制传染源的重要举措。这一重大变化致使全球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现象,那就是,重新唤起人们认识到家庭、社区保护人类生命与健康的作用。在农业社会发展过程中,家族和家庭起到了稳定社会、发展社会的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工业社会快速向前发展,原子化的个体不得不生活在技术市场之中。“现代社会是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只能根据其产品与功绩,而不能根据其出身、种族、个人信仰或类型来取得他的社会地位。”[23]也就是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除了特权阶层,家庭对产品生产、经济收入、个体业绩提升的作用不大。个体对家庭的依赖,家庭伦理对个体的约束力都在变弱。在生存和发展的意义上,个体的人都必须选择通过市场和技术来获得和显示其“身价”。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在虚拟的“朋友圈”和“微信群”中,基于血缘或者拟血缘形成的“虚拟社区”承担着许多交流功能和互助功能,日益发挥着伦理安慰和伦理保护的作用。从某个意义上说,新冠疫情教育了人类,揭示了人类伦理价值的重要性,再次揭示了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肯定了消除伦理距离对人类命运和未来发展的重要性。

(二)透过疫情发展看共生共在伦理精神的觉醒

人们对经济、政治的敏感性直接影响了其对利益距离和政治距离的敏感性;与此同时,文化在自然地、习惯性地影响不同地域、不同国家的人的行动观念。遭受了疫情的打击后,世界各国的利益距离、政治距离和价值距离都有逐渐扩大的趋势。理论研究者需要注意的是,当疫情威胁全球人类生命和健康时,人们最能认同的是尊重生命和保护健康的言语和行动。在这个非常时期,任何不关心、不能保护人的生命健康的行为,无论是政治行为、经济行为还是价值冲突行为都会被视为非伦理的行为,都会遭到全世界人民的批评和反对。因此,无论是英国首相提出的“群体免疫”方案,还是美国总统“甩锅”的政治话语,或是一些自媒体中相互攻击、破坏团结的个

人话语,都毫无例外地会遭到严厉批评。这些新的变化表明:在人类生存的“地球村”中,人是共生共在的,世界各国之间的伦理距离在逐渐缩小,这是进一步推动全球合作治理需要注意的新力量。

目前看来,这种新的变化还是细微的,其力量也无法根本性地影响全球行动,更不能说彻底冲击社会发展进程中已有的组织基础、市场结构与市场力量,也无法撼动工业社会以来形成的制度基础、制度体系和分配体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世界局势、国家发展和政党的行动方式,依然会有路径依赖,会根据既往路径慢慢前行。然而,这一新力量会继续发展和成长,一旦人类面对重大公共安全危机,一旦这种危机冲击现有国际秩序的运行基础,这种伦理力量就会变得越来越强大,而且这种现在看起来微弱的共生共在的伦理,很可能内化成为国际关系、政府组织、市场体系的基本观念和行动力量。

(三)重视共生共在伦理精神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

从国内来看,当一个国家越是经历重大自然灾害或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便越凸显出作为生命共同体的特质,原来各个单子式个体的散漫行为和兴趣,都会集中到与人的个体生命生存最为相关的事件发展上来。[24]从全球来看,当人类遇到重大公共安全危机时,既有的政治秩序已不再作为社会秩序的基础。[25]从而,面对全球疫情导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重大变化,世界各国的行动话语和制度要直面伦理合法性的检验。习近平坚定不移地指出:“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已日益成为休戚相关、密不可分的命运共同体。”“埃及前总理埃萨姆·谢拉夫表示,中国同其他国家携手抗疫,真诚开展国际合作和互助,共同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彰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6]目前看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意识到,如果应对疫情的国内、国际制度缺乏伦理合法性基础,其行动力就是不足的。

从理论上分析,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具有多层结构,有巨大的包容性,既包含着经济思想、政治思想,又包含着价值思想和伦理思想。就目前的研究而言,其中的伦理思想最需要理论界去挖掘。然而,由于伦理观念、伦理价值和伦理约束都是隐性运行的,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本质很难直接呈现在一般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之中。因此,针对当前的疫情,面对全球重大的公共安全危机,除了从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继续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更广泛的全球合作外,更需要宣扬其中共生共在的伦理思想,并使之系统化地发展成为新的国际伦理思想,从而孕育形成全球新的伦理文化。

总之,尽管疫情的爆发加大了世界各国之间存在的利益距离、政治距离和价值距离,但在应对疫情等重大公共安全危机的过程中,共生共在国际伦理力量越来越凸显出来,相比之下,国家主义、民粹主义、市场主义、个人主义都显得底气不足。在这个意义上,如果忽视共生共在的新伦理精神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可能忽视了重要的、引导全球行动的新力量。

四、理解和践行共生共在的国际伦理准则

2020 年对世界各国而言非同寻常而且极其艰难,因为新冠疫情通过人传人蔓延到了整个世界,危害极大,惊扰并改变世界。习近平应约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电话时指出:“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再次表明,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27]联合国秘书长也指出:“我们正面临着联合国 75 年历史上前所未见的全球健康危机。全球经济衰退基本是肯定的……这是一场需要团结应对,才能度过的人类危机。”[28]现实的问题在于,面对新冠疫情引发的全球公共危机,如何才能让世界各国深刻认识到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如何才能让世界各国深刻理解,这是一场需要团结应对才能度过的人类危机呢?

我们认为,当疫情与人类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人类面临着重大的公共安全危机时,要

促进全球开展合作行动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好的方式是理解和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共生共在的伦理精神，缩小伦理距离，凸显伦理构建路径。一方面，世界各国要通过各种合作来跨越利益距离、政治距离和价值距离的障碍；另一方面，在世界各国合作行动的过程中，认同共生共在的国际伦理，践行共生共在的国际伦理准则极其关键。

在全球应对疫情等重大公共安全危机的过程中，人类命运的共生共在要求世界各国理解和践行共生共在的国际伦理准则。

一是疫情全球肆虐毫不留情地夺走人的生命，凸显了人的共生共在。在研究和认识的意义上，透过地域可以将人分为西方人、东方人或欧洲人、亚洲人、美洲人等；透过国家边界可以将人分为中国人、美国人、英国人、意大利人、俄罗斯人等；透过种族可以将人分为白种人、黄种人和黑种人等；透过家庭可以将人分为父母、孩子等不同的角色。然而，在疫病传染过程中，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传染病的媒介，每个人可能潜在地威胁他人，但每个人也可以保护每个人。14 世纪中叶的黑死病，横扫亚非欧三大洲，欧洲人口的死亡率约为 1/3，无数生命逝去，无数亲人离去，无数家庭破碎。1918 年人类的大流感咆哮全球，几千万人失去了生命。即使在科学技术已高度发展的当下，新冠疫情依然具有打击全球的能力，不分富贵贫贱，不分强国弱国，不分东方西方。疫情告诉我们，人是共生共在的。

二是疫情在全球传播冲击了全人类的生活，凸显了人的共生共在。“在人类历史的舞台上，疫灾作为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重要因子，从来没有缺席过。”[29]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各种瘟疫与之相随。鼠疫、伤寒、天花、麻疹、非典、埃博拉出血热、高致病性禽流感、新冠肺炎等都在不同的时期冲击人类。科学和历史都告诉我们，瘟疫是传染病，必定人传人，它不限地域、不分国家地区、不管宗教和文化、不管发达或不发达、也不管贫穷还是富有……正是在共生共在的意义上，防控新冠疫情成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一场非常重要的战役，前所未有；正是在共生共在的意义上，新冠疫情才形成了“二战”以来对西方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最严峻的冲击。

三是疫情的全球挑战需要人类团结合作，凸显了人的共生共在。所有的大瘟疫对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行动方式等方面都会产生巨大影响，都表明了地球上的每个生命都是共生共在的。在实践行动中，只有承认人的共生共在，才能团结合作，有效应对疫情。习近平就新冠肺炎疫情致电德国总理默克尔时表示：“公共卫生危机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团结合作，互利合作是最有力武器。”[30] 为有效应对疫情，全球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以及地球上的每个人，都需要团结合作，需要通过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合作行动，坚持和践行共生共在的国际伦理。只有这样才能很好地保护共生共在、共命运的人类。

如果承认了共生共在的国际伦理，践行了共生共在的国际伦理准则，那么，世界各国就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的伦理内涵、伦理指向和伦理价值有更深入的认同。

其一，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其中最重要的是人，是每个活生生的人的生命，而不只是国家、民族、经济体这些建构的成分。其二，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守护人类生命健康与安全、维护人类的未来是每个国家、每个民族中的每个人的责任，而不只是哪些国家、哪些民族或者哪些人的责任。其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关注的是人类，是人类的所有人，是人类所有共生共在的人的美好生活。因此，在“地球村”中，在人类共生共在的命运中，任何人、任何民族乃至任何国家都不能享有优先权。其四，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疫情，特别是全球重大公共安全危机，让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加透明可见，“人再也不可能独自生存，而是需要把自己的生存寄托于他人同样能够生存下去的前提下。这就是人的共生共在。”[31]

尽管,人类痛恨疫情,人类也害怕疫情,然而,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新冠疫情的发展可能存在长期性和反复性,从而给世界各国的治理,以及有效开展全球治理增加了难度。在这个意义上,有效应对疫情危机、减少经济损失、缓和政治震荡、保护人类安全,考验着各国政府的治理理念、治理能力,考验着各国的制度优势,更考验着国际关系的行为准则及其合作行动能力。归根结底,也考验着世界各国对共生共在伦理精神的理解,考验着世界各国对共生共在国际伦理准则的践行能力。进一步而言,世界各国在应对疫情,应对粮食安全、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疾病流行、跨国犯罪等全球公共安全危机时,要深刻理解人类共生共在的命运,践行共生共在的国际伦理准则,才能将"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转化为"全球行动"与"全球智慧",才能更有效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不仅是一种理论要求,更是一种实践需求。

注释:

〔1〕肖玉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之维》,《重庆社会科学》2017 年第 12 期。

〔2〕王泽应:《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意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4 期。

〔3〕向玉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伦理意蕴》,《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3 期。

〔4〕Melanie Hart, Blaine Johnson, "Mapping China's Global Governance Ambitions", *Foreign Policy and Security Cap*, https://www.americanprogress.org/issues/security/reports/2019/02/28/466768/mapping-chinas-global-governance-ambitions.

〔5〕〔18〕〔21〕〔法〕保罗·利科:《从文本到行动》,夏小燕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213、207、183 页。

〔6〕赵旭东:《互惠人类学再发现》,《中国社会科学》2018 年第 7 期。

〔7〕Maximilian Mayer, "China's Historical Statecraft and the Return of Histor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4, No. 6, 2018, pp. 1217-1230.

〔8〕罗云、胡尉尉、严双伍:《西方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知和评介》,《社会主义研究》2020 年第 1 期。

〔9〕叶险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复杂性与全球治理——一种新全球治理理念的构建》,《河北学刊》2019 年第 6 期。

〔10〕〔12〕张康之:《论人的互惠互利、相互依存与共生共在》,《天津社会科学》2019 年第 4 期。

〔11〕〔荷〕G. 霍夫斯坦德:《跨越合作的障碍——多元文化与管理》,尹毅夫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96 年,第 12 页。

〔13〕〔14〕〔以〕尤瓦尔·赫拉利:《冠状病毒之后的世界》,《金融时报》2020 年 3 月 2 日。

〔15〕凌馨:《世贸组织总干事:新冠疫情不必然导致逆全球化》,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2020-04/09/c_1125832565.htm。

〔16〕〔26〕杨迅、曲翔宇、刘慧等:《凝聚抗疫合力 提振全球信心——国际社会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人民日报》2020 年 3 月 26 日。

〔17〕《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声明》,《人民日报》(海外版)2020 年 3 月 27 日。

〔19〕张康之:《论民族国家在全球化中的处境》,《学术界》2019 年第 3 期。

〔20〕〔德〕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郑作彧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导论第 008 页。

〔22〕〔23〕〔25〕〔法〕阿兰·图海纳:《我们能否共同生存?——既彼此平等又互有差异》,狄玉明、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年,第 45、43、55 页。

〔24〕梅景辉:《重大疫情中共同体秩序建构的哲学思考》,《光明日报》2020 年 2 月 10 日。

〔27〕《习近平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电话》,《人民日报》2020 年 3 月 13 日。

〔28〕王建刚:《古特雷斯:全球经济"几乎肯定"会衰退》,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0-03/20/c_1125740234.htm。

〔29〕龚胜生:《中国古代疫灾发生的规律与思考》,《光明日报》2010 年 3 月 11 日。

〔30〕《就德国发生新冠肺炎疫情 习近平向德国总理默克尔致慰问电》,《人民日报》2020 年 3 月 22 日。

〔31〕张康之:《为了人的共生共在》,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205 页。

〔责任编辑:刘姝媛〕